

侯杰 赵天鹭 著

變法圖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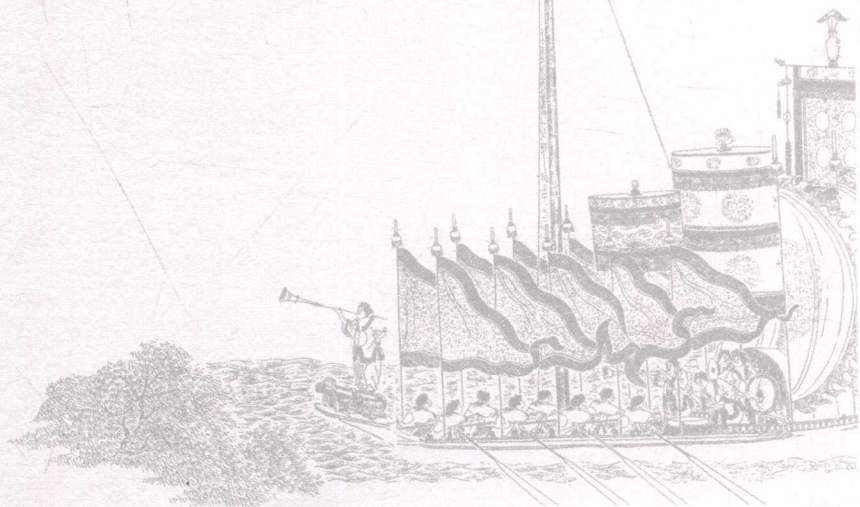
近代的挑战与革新

中国文化二十四品



饶宗颐 叶嘉莹 顾问
陈洪 徐兴无 主编

教育部中文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推荐读物



侯杰 赵天鹭 著

變法圖強

近代的挑战与革新

▲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化二十四品



饶宗颐 叶嘉莹 顾问
陈洪 徐兴无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变法图强 : 近代的挑战与革新 / 侯杰, 赵天鹭著.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 1

(中国文化二十四品)

ISBN 978-7-214-17540-3

I. ①变… II. ①侯… ②赵… III. ①政治改革—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D6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3208号

书 名	变法图强——近代的挑战与革新
著 者	侯 杰 赵天鹭
责 任 编 辑	卞清波
责 任 校 对	张晓薇
装 帧 设 计	刘亭亭 张大鲁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5.5 插页 3
字 数	174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17540-3
定 价	36.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编委会名单

顾问

饶宗颐

叶嘉莹

主编

陈 洪(南开大学教授)

徐兴无(南京大学教授)

编委

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司冰琳(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白长虹(南开大学教授) 孙中堂(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

闫广芬(天津大学教授) 张伯伟(南京大学教授)

张峰屹(南开大学教授) 李建珊(南开大学教授)

李翔海(北京大学教授) 杨英杰(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陈引驰(复旦大学教授) 陈 致(香港浸会大学教授)

陈 洪(南开大学教授) 周德丰(南开大学教授)

杭 间(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侯 杰(南开大学教授)

俞士玲(南京大学教授) 赵 益(南京大学教授)

徐兴无(南京大学教授) 莫砺锋(南京大学教授)

陶慕宁(南开大学教授) 高永久(兰州大学教授)

黄德宽(安徽大学教授) 程章灿(南京大学教授)

解玉峰(南京大学教授)

总 序

陈 洪 徐兴无

我们生活在文化之中,“文化”两个字是挂在嘴边上的词语,可是真要让我们说清楚文化是什么,可能就会含糊其词、吞吞吐吐了。这不怪我们,据说学术界也有 160 多种关于文化的定义。定义多,不意味着人们的思想混乱,而是文化的内涵太丰富,一言难尽。1871 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中给出了一个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上来说,是包含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①其实,所谓“文化”,是相对于所谓“自然”而言的,在中国古代的观念里,自然属于“天”,文化属于“人”,只要是人类的活动及其成果,都可以归结为文化。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②在这种自然欲望的驱动下,人类的活动与创造不外乎两类:生产与生殖;目标只有两个:生存与发展。但是人的生殖与生产不再是自然意义上的物种延续与食物摄取,人类生产出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不再靠天吃饭,人不仅传递、交换基因和大自然赋予的本能,还传承、交流文化知识、智慧、情感与信仰,于是人种的繁殖与延续也成了文化的延续。

所以,文化根源于人类的创造能力,文化使人类摆脱了

①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谢继胜、尹虎彬、姜德顺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 页。

② 《礼记·礼运》。

自然,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让自己如鱼得水一样地生活于其中,每一个生长在人群中的人都是有文化的人,并且凭借我们的文化与自然界进行交换,利用自然、改变自然。

由于文化存在于永不停息的人类活动之中,所以人类的文化是丰富多彩、不断变化的。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方向、不同的特质、不同的形式。因为有这些差异,有的文化衰落了甚至消失了,有的文化自我更新了,人们甚至认为:“文化”这个术语与其说是名词,不如说是动词。^① 本世纪初联合国发布的《世界文化报告》中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文化再也不是以前人们所认为的是个静止不变的、封闭的、固定的集装箱。文化实际上变成了通过媒体和国际因特网在全球进行交流的跨越分界的创造。我们现在必须把文化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产品”^②。

知道文化是什么之后,还要了解一下文化观,也就是人们对文化的认识与态度。文化观首先要回答下面的问题:我们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共同体中的人们的看法异彩纷呈,但自古以来,人类有一个共同的信仰,那就是:文化不是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创造的。

有的认为是神赐予的,比如古希腊神话中,神的后裔普罗米修斯不仅造了人,而且教会人类认识天文地理、制造舟车、掌握文字,还给人类盗来了文明的火种。代表希伯来文化的《旧约》中,上帝用了一个星期创造世界,在第六天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类,并教会人们获得食物的方法,赋予人类管理世界的文化使命。

① 参见[荷兰]C. A. 冯·皮尔森:《文化战略》,刘利圭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页。

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关世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

有的认为是圣人创造的，这方面，中国古代文化堪称代表：火是燧人氏发现的，八卦是伏羲画的，舟车是黄帝造的，文字是仓颉造的……不过圣人创造文化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受到天地万物和自我身体的启示，中国古老的《易经》里说古代圣人造物的方法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易经》最早给出了中国的“文化”和“文明”的定义：“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指文采、纹理，引申为文饰与秩序。因为有刚、柔两种力量的交会作用，宇宙摆脱了混沌无序，于是有了天文。天文焕发出的光明被人类效法取用，于是摆脱了野蛮，有了人文。圣人通过观察天文，预知自然的变化；通过观察人文，教化人类社会。《易经》还告诉我们：“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宇宙自然中存在、运行着“道”，其中包含着阴阳两种动力，它们就像男人和女人生育子女一样不断化生着万事万物，赋予事物种种本性，只有圣人、君子们才能受到“道”的启发，从中见仁见智，这种觉悟和意识相当于我们现代文化学理论中所谓的“文化自觉”。

为什么圣人能够这样呢？因为我们这些平凡的百姓不具备“文化自觉”的意识，身在道中却不知道。所以《易经》感慨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什么是“君子之道鲜”？“鲜”就是少，指的是文化不昌明，因此必须等待圣人来启蒙教化百姓。中国文化中的文化使命是由圣贤来承担的，所以孟子说，上天生育人民，让其中的“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①。

^① 《孟子·万章》。

无论文化是神灵赐予的还是圣人创造的，都是崇高神圣的，因此每个文化共同体的人们都会认同、赞美自己的文化，以自己的文化价值看待自然、社会和自我，调节个人心灵与环境的关系，养成和谐的行为方式。

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喜欢谈论文化的时代。平民百姓关注茶文化、酒文化、美食文化、养生文化，说明我们希望为平凡的日常生活寻找一些价值与意义。社会、国家关注政治文化、道德文化、风俗文化、传统文化、文化传承与创新，提倡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说明我们希望为国家和民族寻求精神力量与发展方向。神和圣人统治、教化天下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只有我们这些平凡的百姓都有了“文化自觉”，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是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整个社会和国家才能拥有“文化自信”。

不过，我们越是在摆脱“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文化蒙昧”时代，就越是要反思我们的“文化自觉”，因为“文化自觉”是很难达到的境界。喜欢谈论文化，懂点文化，或者有了“文化意识”就能有“文化自觉”吗？答案是否定的。比如我们常常表现出“文化自大”或者“文化自卑”两种文化意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不可能生活在单一不变的文化之中，从古到今，中国文化不断地与其他文化邂逅、对话、冲突、融合；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中国文化不仅不再是古代的文化，而且不停地在变革着。此时我们或者会受到自身文化的局限，或者会受到其他文化的左右，产生错误的文化意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流水如此，文化也如此。对于中国文化的主流和脉络，我们不仅要有“春江水暖鸭先知”一般的亲切体会和细微察觉，还要像孔子那样站在岸上观察，用人类历史长河的时间坐标和全球多元文化的空间坐标定位中国文化，才能获得超越的眼光和客观真实的知识，增强与其他文化交

流、借鉴、融合的能力，增强变革、创新自己的文化的能力，这也叫做“文化自主”的能力。中国当代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说：

“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许可以说，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希望中国文化在对全球化潮流的回应中能够继往开来，大有作为。^①

因为要具备“文化自觉”的意识、树立“文化自信”的心态、增强“文化自主”的能力，所以，我们这些平凡的百姓需要不断地了解自己的文化，进而了解他人的文化。

中国文化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它博大精深，但也不是不得其门而入。为此，我们这些学人们集合到一起，共同编写了这套有关中国文化的通识丛书，向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特征、物质成就、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主要知识，在介绍的同时，帮助读者选读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经典资料。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饶宗颐 and 叶嘉莹两位大师前辈的指导与支持，他们还担任了本丛书的顾问。

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中国人写书也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理想，甚至将书中的内容按照宇宙的秩序罗列，比如中国古代的《周礼》设计国家制度，按照时空秩序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大官僚系统；吕不韦编写《吕氏春

^① 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光明日报》2000年11月7日。

秋》，按照一年十二月为序，编为《十二纪》；唐代司空图写作《诗品》品评中国的诗歌风格，又称《二十四诗品》，因为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我们这套丛书，虽不能穷尽中国文化的内容，但希望能体现中国文化的趣味，于是借用了“二十四品”的雅号，奉献一组中国文化的小品，相信读者一定能够以小知大，由浅入深，如古人所说：“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2015年7月

目 录

绪言

天朝危局:中国现代化之路向何方

前近代的中国与世界 / 9

鸦片战争及其后果 / 16

从经世思潮到开眼看世界 / 20

原典选读 / 31

人间“天堂”:太平天国的艰难寻觅

洪秀全:以西方宗教改变中国 / 39

洪仁玕:用西方制度文化改变中国 / 44

太平天国变法图强之路解析 / 47

原典选读 / 53

自强求富:洋务运动与中国现代化的探索

洋务派与“中体西用”观的提出 / 63

从自强到求富:洋务派选择的现代化道路 / 68

夹缝求生的“中兴”:品评洋务运动 / 84

原典选读 / 91

维新变法：志士仁人的救国思想与实践

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 / 101

维新运动的兴起与戊戌变法 / 107

维新变法的历史遗产 / 118

原典选读 / 123

清末新政：“变法自强”的新尝试

义和团运动与清朝政府的统治危机 / 133

“以变而不失其正”的官制军制学制改革 / 140

捆住手脚跳舞——预备立宪 / 146

原典选读 / 155

旧邦新造：帝制终结与民国初创

清末中国文化变迁与民主革命的兴起 / 167

清朝覆亡，民国肇基 / 180

辛亥革命的成与败 / 185

原典选读 / 189

五四洗礼：从文化革新到社会革命

民国初年政治现代化的波折 / 201

尊孔复古与新文化运动 / 206

反思西方：文化重建与以俄为师 / 214

原典选读 / 222

结语

绪 言

距今约 7000 年前，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一批远古文明，人类步入了文明时代。此后，随着文明的扩散与文化的交融，世界上又形成了中国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等主要文化圈。

尽管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和科技水平的制约，古代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往来不及今日便利，然而这种交流还是留下很多难以抹去的印痕。根据考古学发现，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及至秦汉时期，陆路、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中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经久不辍。中西之间或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多载于中外典籍之中，直到清朝政府统治时期因采取闭关政策而渐趋萎缩。

在历史的岁月中，中华文化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可被称作“王朝循环”的模式：自秦至清，“大一统”的王朝统治交替实行了 2000 余年，其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结构，政治基础是中央集权的皇权制度与文官组织相配合的结构，改朝换代的动因是内部的分裂或农民起义。江山易主，循环往复，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却一脉相承，只发生着缓慢的微小变化。政治统一、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虽然展现出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但是也容易造成僵化的心理定势，产生文化优

越感,在面对危机时,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至清朝政府统治时期,君主专制与传统儒家学说愈发丧失活力,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束缚。传统中国的发展模式极大地阻碍了现代政治、经济、法律体制以及伦理观念的确立。

然而,欧洲并未形成像中国这样的“大一统”帝国。罗马帝国虽然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实力维持了政治统一,但是却没能形成统一的民族文化体系;基督教会曾以教权代替王权,重新整合了欧洲的文化风貌,却仍然保留了族群林立的封建制度。长期的族群林立保留了欧洲文化的多样性,在遇到内外挑战的时候,各种异质性的特色,可使它们从众多选项中找出某种适应方式。与东方强大的专制帝国不同,中世纪的欧洲长期实行封建制度,土地由封君分配给臣属,双方以契约形式固定相互关系,各享权利,各尽义务。封建领主在各自领地享有完全独立的行政、司法权,每一个封建庄园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自给自足的经济、分散的权力以及松散的社会联系,让中世纪的欧洲在许多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中国。然而,在西欧也有一些独特的城市和商业文化,值得关注。西欧的城市从封建主手中赎买或夺取,在经济上与庄园经济体系互不统属;在政治上实行城市自治,不存在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体制外”的市民社会虽然力量弱小,却是新思想、新文化的策源地,资本主义在此孕育成长、破土而出。

1500年前后,西欧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农奴制解体、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解除了人身束缚与思想束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地理大发现,西欧社会的商业精神也得到伸张。西欧至此开始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转变。此后,经过启蒙运动和一系列改革与革命运动,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在欧洲各国建立起来。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上半叶,英国率先开展并完成了工业革命,技术革新引发了

生产力的显著提升,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劳动。产业革命随后传至欧洲大陆及北美地区,欧美各主要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为谋求自身发展,西方国家开始海外掠夺与殖民扩张,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资源与商品市场。原本在西欧一隅创生的资本主义文明,经由西方国家的全球扩张而具备了一定的世界性与普遍性。诚如《共产党宣言》所言:“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进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的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无论情愿与否,中国等非西方的民族和国家逐渐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有识之士只能尝试着适应这种变化了的世界格局,为本民族国家的振兴与发展而不断奋斗。至此,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新阶段。何谓“现代化”(Modernization)? 依据当代中国学者罗荣渠的定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化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家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正如一些外国学者所说,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

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它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

现代化是一个比较系统的浩大工程，包括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学术知识科学化，社会生活城市化，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化、人性化等。现代化标榜生产力的解放与人性的解放，它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却又不专属于西方社会。现代化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方化”、“工业化”，然而由于西方国家超强的实力与文化上的优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欧美国家的发展经验就成为了其他国家学习、仿效的榜样。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又往往表现为在各个领域的西方化。在追逐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冲突、碰撞、吸收、融合乃至综合创造，演绎出哪些充满喜怒哀乐的故事？这也成为认识和品评中国文化近代命运的重要方面。

自鸦片战争（1840—1842）在英国的坚船利炮的攻击下失败之后，中国的主权不断受到损害，传统的“王朝循环”被打破，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现代转型。西方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联袂东传，从南至北、由沿海至内地，对中国社会各界人士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潮流，在近代中国社会不断掀起波澜。为拯救民族危亡，不少志士仁人勇敢地接受来自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探索变法图强之道。

早在19世纪中叶，部分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先驱就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主张，可惜未能产生显著的社会影响。而脱胎于农民革命的太平天国运动，也是依靠改造后的西方宗教来动员、组织民众的，只是到了革命后期，部分领袖人物才意识到全面学习、推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19世纪60—90年代，清朝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官员开始了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他们想在不改变传统体制的前提下，从军事、

经济、教育、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进行有限的现代化改革。然而,这种不彻底的变革最终不能带领中国走向富强。

中国在甲午战争(1894—1895)中对日本的军事失利,引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觉醒与文化自觉,效法西方先进制度的思想渐成主流。改良派与革命派开始崛起,前者主张推行温和的资本主义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后者则赞同暴力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建立全新的民主共和国家。戊戌变法是改良派参与的一次并不成功的政治实践,而发端于清朝最后10年(1901—1911)的清末新政,则是清朝政府为解除统治危局而进行的现代化改革,也可视为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继续。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出现了。然而,民初政局十分动荡,最终滑向了军阀混战和割据的深渊。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了政治革命的局限性,开始关注国民思想观念的启蒙,着力清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此展开。各种西方学说纷纷涌入中国,思想界渐趋活跃。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这场文化革新运动走向深入。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认识不断提高,变法图强事业进入新阶段。

勿须讳言,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与西方国家的介入有关。这场由浅入深渐次展开的变革,受到外部、内部双重作用的牵引和驱动。首先是一连串外事的刺激使之不断深化和完善。如黄仁宇所言:“除了鸦片战争结束时朝廷犹以‘筹办夷务’的方针对待各国,可算迟钝外,以后较深的刺激,已作梯度式的反应。造船制械、力求争取现代科技的改进既无实效,则企图从法制方面革新,如修改宪法、编列预算。这样的计划可能动摇传统以‘圣谕’及‘皇恩’统治全国的根本,于是索性推翻2000多年来的君主制度。如此再无实效,则发动五四运动,知识分子主张本身的革新,及于生活习惯语言文